



特首中亞行三大亮點 鞏固優勢強化戰略合力

柳凡

觀香港

在全球經貿格局重組、區域合作成為增長主流的大勢之下，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領域商貿及專業代表團，圓滿完成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中亞重點訪問。此次外訪以開拓新興市場、深化政府間合作、構建「樞紐對樞紐」合作模式為三大目標，行程密集、對接精準、成果扎實，不僅收穫大量落地合作項目，更透過三個層面的重大突破，重塑香港與中亞的合作定位，為香港多元經貿布局、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寫下新篇章。

整趟訪問最具戰略價值之處，可歸納為市場突破、協同創新、體系升級三大亮點。

第一大亮點：突破傳統市場依賴，開闢經貿增長新藍海

長期以來，香港的對外經貿往來集中於歐美及東南亞市場，市場結構過分集中，增量空間受限，面對國際形勢變化，經貿

發展的穩定性與韌性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特區政府主動出擊、謀求變局，將戰略目光投向潛力龐大的中亞地區。中亞地處亞歐大陸核心樞紐，資源豐富、產業轉型提速、基礎建設需求旺盛，是當今全球極具發展潛力的新興板塊，亦是香港拓展離岸市場、實現經貿多元化的關鍵突破口。

中亞行精準落地大量實質性成果，拉開香港進軍中亞市場的嶄新序幕。代表團走訪兩個中亞核心大國，參與超過二十場官方交流與商貿對接活動，深入考察金融、創科、基建等前沿領域，累計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相關落地項目總值超16.5億美元。從政府層面的雙邊合作文件，到商界、專業界的產業對接協議，覆蓋商務投資、金融服務、科技創新、航空物流、教育發展等多元領域，標註着香港與中亞的合作告別過往淺層次、零散化的往來模式，邁入項目落地、資本對接、產業共融的高質量合作階段。這一市場層面的突破，有效優化香港對外經貿版圖，為香港長遠

經濟增長注入全新增量動能。

第二大亮點：兩地聯動「併船出海」，強化戰略合力

中亞行更好實踐了「香港+內地企業」聯合出海的協同新模式，充分釋放「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此次代表團為「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成立以來，首次由行政長官親自率隊的香港與內地聯合外訪隊伍，改變了過去香港單獨對外拓展、力量單薄的局限，實現優勢互補、資源賦能。

在合作邏輯上，內地企業具備完備的產業體系、龐大的項目資源與堅實的執行能力，能夠承接大型基建、實體產業等重點項目；而香港擁有國際化制度優勢、專業服務優勢、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全球性的網絡，可提供融資、法律、會計、風控、市場對接等高端專業支援。兩地企業聯手出海，互取所長、互補短板，產生更大的疊加效應，本次超過八成的產業合作成果皆源自這一協同模式，充分驗證了香港與內地聯合開拓海外新興市場的可行性與高

效性。這一有效合作範式，不僅是本次訪問的重大亮點，更為未來香港聯同內地深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參與國際區域合作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成熟路徑。

第三大亮點：構建「樞紐對樞紐」格局，搭建長效多維合作體系

不同於一般外事訪問的短期成果導向，是次中亞之行實現層級更高、影響更深的戰略突破，正式確立香港與中亞國家「樞紐對樞紐」的長遠合作定位，搭建起全方位、制度化、常態化的合作體系。香港作為亞太地區核心國際樞紐，聯通全球資本、技術與人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作為中亞區域核心樞紐，輻射整個亞歐內陸市場，兩大樞紐體系精準對接，讓雙邊合作從單個項目合作，升維為區域層面的戰略協作。

與此同時，雙方落地一系列制度性、基礎性配套安排，築牢長遠合作根基。在制度保障上，兩國同意與香港啟動避免雙重課稅、投資保護協定磋商，同時推動海

關互認安排，大幅降低企業跨境經營成本與風險，優化貿易通關效率。在聯通配套上，香港將於2027年開通直飛阿拉木圖航線，特區政府與烏茲別克斯坦政府草簽航空運輸協定，實現空中樞紐直連；雙方亦達成30日互免簽證共識，大幅便利商務、學術與觀光往來。在人文與產業深耕上，香港多所高校與中亞科研機構開展人才交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當地國家博物館結成合作夥伴，實現經貿、制度、交通、人文多維度齊發。

整體而言，是次中亞訪問務求真、立意深遠。三大亮點層層遞進，從市場層面的增量突破，到合作模式的機制創新，再到戰略格局的體系升級，全方位提升香港對外開放的廣度與深度。未來，香港將持續發揮樞紐功能與「超級聯繫人」優勢，聯通內地、對接中亞，以更多扎實成果服務自身高質量發展，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在亞歐區域合作中持續展現香港新擔當、新作為。

借鑒「閩寧經驗」推動大灣區共融



議事廳
樓家強

習近平總書記1996年在福建工作期間，親自部署和推動了「閩寧對口扶貧協作」。30年來，閩寧協作將荒涼戈壁灘改造成富饒新家園，成為東西部扶貧協作的典範。近年熱播的電視劇《山海情》真實展現了這段脫貧奇跡，劇中突出「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的主題，形容福建和寧夏雖隔千山萬水，但因共同的脫貧志向，克服千難萬險，人心緊密相連。近期筆者隨團赴寧，以香港視角考察學習「閩寧經驗」。國家「十五五」規劃中要求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跨區域協作」——香港與廣東之間的制度融合、市場融會、要素融通。從這個角度，筆者認為「閩寧經驗」不僅開拓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於促進區域融合發展提供了一套可借鑒的成功經驗。

強強聯合 互利共贏

寧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和固原三縣）自古「苦瘡甲天下」，面臨「天上不落雨，地上不長草」的絕境。在閩寧對口扶貧過程中，福建幹部與寧夏群眾共同面對風沙、乾旱與觀念衝突，開啟了吊莊移民工程，累計支持寧夏搬遷安置123萬人，統籌產業、就業、社會融入「三件事」，精準破解了「一方水土養不好一方人」的難題。特別是閩寧鎮從最初的8000人移民，發展為目前常住人口0.61萬的現代化示範鎮，從「乾沙灘」變成了「金沙灘」，2025年全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0292元，較搬遷之初增長超過40倍。

「閩寧經驗」的基礎是頂層設計與長效機制。從領導親自部署，到省級聯席會議，再到建立「市縣結對、鄉鎮村精準對接」的層級協作體系。閩寧協作的30年，不是單次的行政動員，30年間福建選派了逾250名援寧幹部，寧夏有320多名幹部赴閩掛職學習。正是這套持續的長效機制，才能確保決策一貫性和執行連續性，避免短期低效行為。

與單純資金投入不同，「閩寧經驗」的關鍵是將福建的技術、資本、市場渠道與寧夏的資源稟賦精準對接。以菌草養殖為例，兩省通過技術扶貧、產業共建、搭建務工平台等方式，建設了一系列勞動密集型的現代化農業項目，推動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帶動千家萬戶脫貧致富。中共十八大以來，兩省合作打造一批閩寧產業園（城），經過福建招商引資落地項目約850個，依託寧夏豐富的能源、土地、勞動力資源，為福建企業提供發展空間，形成了機械製造、電子資訊、紡織輕工、風力發電、食品和葡萄酒等特色產業項目，極大增強了「造血」功能。

此外，「閩寧經驗」的核心在於人才驅動。除了上述兩省互派幹部之外，福建持續派出教師、醫療隊員、技術骨幹超過3800名，通過輸入人才實現知識和能力的傳遞，由福建援寧專家與本地人才「一對一」結對，以人才驅動產業，最終「教會了寧夏自己走路」。

從西海固到粵港澳，看似場景不同，但問題本質相通：如何讓兩個（或更多）制度背景相異、發展階段不同的區域，通過制度化協作實現深度融合？而大灣區面臨的挑戰則更為複雜，它不是單向的「富幫窮」，而是要探索「強強聯合、

互利共贏」的新路。

區域協作升級為「制度驅動」

將「閩寧經驗」帶入到大灣區，特別是在「十五五」開局階段，筆者認為應重點推進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把握廣東省「十五五」規劃出台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契機，加快粵港澳三地規劃協同的制度化建設，將區域協作從「項目驅動」升級為「制度驅動」，將規劃對接從政策層面上升到法律層面，確保協作的深度和持續性；第二，以「精準對接」的思路重塑灣區產業鏈，大灣區各市之間實現優勢共享，建立更加清晰的產業分工和利益共享機制，從「各自贏利」走向「雙向贏利」、「多向贏利」，特別是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與普通法體系優勢，實現從「做中介」到「做中樞」、「做增值」的關鍵轉型；第三，進一步打通大灣區高端專業人才的通行能力、銜接機制和互認機制，在河套、前海、南沙、橫琴等平台大膽推行「先行先試」，讓香港的高端專業人才，在生產和服務的實踐場景中，「手把手」將寶貴的知識經驗帶入大灣區，實現區域融合發展。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根據「閩寧經驗」的啟示，對香港和大灣區而言，要跨越的「山」指的不是地理，而是制度協同、產業重塑與人才適配。做好這些重點工作，「灣區共融」將從願景變為成果，區域發展也將轉化為持續的社會福祉。這既是「十五五」規劃賦予大灣區的歷史使命，也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經之路。

法律博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教聯會秘書長

五年規劃應強化「雙向對接」功能



議事廳
樓家強

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正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香港五年規劃既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也是為香港自身的未來發展確立明確目標。筆者深感規劃對香港意義重大，因此在過去一段時間積極參與和舉辦多場諮詢會及交流活動，廣泛聆聽不同界別人士的意見，共同為香港的未來出謀獻策。

在諮詢過程中，筆者深刻體會到社會各界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高度關注。無論是土地房屋政策、產業布局，還是交通基建配套，不同界別代表都提出了具體而務實的建議。大家普遍認為應加快制訂北部專屬法例，為發展拆牆鬆綁。期望有關部門全力推進北部專屬法例的立法工作，提速與相關內地機關商討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的落實細節，特別是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的人流、物流、數據流和資金流的自由流通，提供制度性的便利安排。

筆者接觸不少內地及海外大型企業，均表示有興趣進駐北都，並期望掌握到更清晰的規劃及發展時間表。因此，建議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和解說工作，對外讓海內外企業了解北都願景和機遇，對內讓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感受到北都與個人發展息息相關。

「政產學研投」協同發展

作為青年工作者，筆者尤其關注北都大學城的發展。高等教育是香港的優勢產業，大學城是推動創科發展和培養高端人才的關鍵平台。有關部門應該以北都大學城、新田科技城和河套為核心節點，積極落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發展要求，全力構建「政產學研投」協同發展格局。政府提供政策引導和基礎設施，產業界提出實際需求和應用場景，大學和科研機構

負責前沿研究和人才培養，而投資界則為初創企業和科研成果轉化提供資金支持。

要實現大學城願景，在土地規劃方面應有前瞻性的部署。筆者建議在北都預留充足的土地，並加快平整步伐，為大學城的校舍建設、科研設施及相關配套提供及時到位的用地。同時，相關部門應積極引導本地大學與內地及海外知名院校合作，吸引更多國際頂尖學者和研究人員進駐北都，加快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擁有5家世界百強大學，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完全有條件將北都大學城發展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領先的創科人才搖籃。

此外，香港五年規劃應強化「雙向對接」的功能，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一步強化與內地相關機關的常態化對接機制。廣東「十五五」規劃首次提出的「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顯示廣東省高度重視與香港的協同發展。香港應把握機遇，在香港五年規劃中明確與深圳等大灣區內城市的對接路徑，在園區開發、產業導入、項目布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開展緊密協作。當中港兩地是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的夥伴，應進一步加強聯動。當香港的國際化和法治優勢，與深圳的產業鏈和製造業優勢結合起來，共同打造世界級的科技創新集群，在國家的創科發展藍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是一項光榮的歷史性任務。在多場諮詢會和交流活動中，筆者深切感受到社會各界對規劃的殷切期望。香港的五年規劃，既是對接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為香港未來發展訂定清晰路綫的關鍵一步，期望政府吸納各界智慧，制訂出一份真正具宏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規劃，引領香港邁向更繁榮、更宜居、更有活力的新時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說歐洲無法擺脫對美依賴？



看大勢
宋魯鄺

特朗普以毫無爭議的優勢重返白宮及其執政表現，使得歐洲清醒地意識到今天的美國已經根本上變了，民粹化不再是特例而是未來的長期歷史趨勢。美國正從國際秩序的基石和捍衛者演變成破壞者。歐美無論是價值觀還是戰略利益日趨南轅北轍，從理論上講，長期以來號稱牢不可破的大西洋關係正在走向終結。

然而現實面卻是歐洲並沒有遵循這一歷史趨勢，也未採取系統性的行動為美國的離去做準備，相反依然試圖維持大西洋關係，對美國委曲求全，最多也只不過是非暴力不合作。這反常的背後主要有四大原因。

歐盟內部難達成共識

首先，歐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形成共識和付諸行動方面先天不足。

即使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之間的利益往往也是不平衡、不對等的。尤其是在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要想協調需要很大的政治成本和決心，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有力推動才有可能。像中國歷史上的三線建設就是如此。所以類似的問題放到

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歐盟身上，難度和成本則是幾何級擴大。

目前歐盟內部的中東歐國家、北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安全嚴重依賴美國，因此反對任何和美國脫離的政策。這和強調戰略自主的西歐國家、親俄的匈牙利、捷克等國根本不可能有共識。

其次，由於歷史慣性，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太深，雙方可謂深度捆綁。

二戰之後，西方就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歐洲跟隨的國際體系。美國不僅提供安全保障，還向歐洲開放龐大的市場。歐洲除了可以將資源主要投入經濟發展，還能獲得僅次於美國的國際地位。

今天美國是歐盟最大的單一貨物貿易夥伴，2024年對美出口佔歐盟總出口的20.6%，達到5300億歐元，順差近2000億，超過了歐盟和其他國家的順差總和。歐洲的產業支柱汽車也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同時歐盟企業在美國投資存量大達3.64萬億美元（可資對比的是在中國投資存僅為1500億美元）。2025年，美國供應了歐盟58%的液化天然氣，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進口的份額高達96%。僅就天然氣而言，歐盟對美國的依賴已經超過過去對俄羅斯的依賴程度。

至於安全，目前美國承擔北約60%的防務開支，同時提供情報、後勤和軍事技術。歐洲每兩歐元的軍購就有一歐元流向美國，足見對其軍備的依賴。正如北約秘書長呂特今年在歐洲議會所公開承認的：「如果這裏還有人認為，歐盟或整個歐洲，可以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自我防衛，那就繼續做夢吧。做不到。我們做不到。我們彼此需要。」若歐洲國家真的想單打獨鬥，國防支出必須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0%，同時還得建立自己的核能力，這將耗費十億歐元計的成本。「在那種情況下，你們將失去我們自由的終極保障，也就是美國的核保護傘。」

可以說這種全方位的依賴使得歐洲面對美國時幾乎沒有議價權。

第三，歐盟內部的政治分歧發生質變，大大提升了歐美關係調整的難度和複雜度。

過去歐盟各個國家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由於都是建制派，分歧不過是政策層面，在國家根本利益、基本方向上還是有共識。但在今天，由於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這種國家政治層面的共識不復存在。外交是內政的反應。歐洲內部的政治變化也必然投射到大西洋關係上。

過去歐洲內部政治不影響和美國的關

係。但在今天則相反。如果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執政，它會支持特朗普和共和黨。相反則支持美國的民主黨。在「特朗普2.0」的今天，歐洲右翼民粹得到美國毫不掩飾的公開支持，它們也自然反對和美國任何脫離的政策。

美更加無視歐洲利益

美國如果是民主黨執政，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則會強烈地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像拜登時期，匈牙利就非常反對制裁俄羅斯、否決援烏資金、反對武器輸送，和美國大唱反調。拜登舉辦民主峰會也把匈牙利排除在外，匈牙利就一票否決歐盟為峰會作出共同貢獻的提議。

由於受選舉周期影響，歐美右翼民粹的執政時間不盡相同，這也增加了歐美關係的複雜性、形成共識和改變的難度。

2027年法國將舉行總統選舉，根據民調，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將獲勝。考慮到法國在歐盟的分量，其對歐美關係的影響也將是巨大的，大西洋關係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又會上升一個新的級別。

最後則是中國因素

2019年，歐盟面對俄羅斯和特朗普的巨大挑戰，首度將中國定性為制度性或系

統性對手。這違反地緣政治常規的做法表明，歐盟已將中國視為超過俄羅斯和美國的最大威脅。即在歐盟看來，中國是未來唯一能夠取代西方文明五百年主導地位的國家。

為此，歐盟如果和美國對抗，正與美國戰略博弈的中國將是最大獲利者，會幫助中國更快地取代西方，這是歐洲無法接受的。為此，僅憑自己力量無法抗衡中國的歐洲就只能選擇盡一切努力維持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也就是說，當下的歐洲對美國戰略忍讓，對俄羅斯戰略對抗，對中國則是戰略施壓。所以，哪怕是中美關係走向緩和與穩定，中歐關係卻不見改善，雙方的衝突還一再發生。

正是以上四大因素，決定了不管美國如何損害歐洲的利益，它都無法、無意擺脫美國。深諳此原由的美國則更加無視歐洲利益，把它當作謀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歐洲畢竟也還稱得上是「瘦死的駱駝」，只要它不走向和美國對抗的道路，就依然有利利用的價值。這也是當下歐洲依然可以對美經靖、大西洋關係依舊殘存的原因。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